

阚昱静 著

不只是往事

Reihe Phönixfeder 65

OSTASIEN Verlag

后记

从1949年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他1976年逝世跨越了将近三十年，这段历史至今对中国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最初的几年里，伴随着农村的集体化进程，中国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这一进程曾得到相当大部分民众热情的欢迎。然而，不久之后便出现了最初的幻灭感，首先是知识分子，随后是普通百姓，他们为此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56/57年发动的“百花运动”，号召人们对党的领导提出批评，起初似乎是在尝试允许就中国政治未来应采取的发展方向展开讨论。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便爆发了“反右运动”，在此运动中，那些提出批评的人纷纷失宠，并被大批送往劳改营。紧接着，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旨在使工业，尤其是钢铁生产赶上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并要求不加思索地将一切金属熔化，这反过来又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投入高炉炼钢运动中来。这场运动在1958年至1962年间造成了农业大面积歉收，并最终导致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¹

1966年由毛泽东主导，并主要由年轻人，即所谓的“红卫兵”推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表面上以建立平等的社会秩序为目标，实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以及社会现有的阶层体系发动全面而且激烈的冲击。这场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影响迄今仍深刻地塑造着中国社会的面貌。运动期间，高等院校和大

1 正如弗兰克·迪克特（Frank Dikötter）在其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最具毁灭性的灾难史》（纽约：沃克出版社，2010年）序言第12页中所述，他依据近千份得以查阅的档案文件指出，相较于以往所认为的一千五百万至三千二百万人，应当将该时期的死亡人数估算为至少四千五百万人。

学被迫停办，礼仪和尊重被斥为“资产阶级”而遭到唾弃，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

昔日的“红卫兵”如今已退休，但是许多人依然在世，而公众对他们当年所作所为的公开反思与追责，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学术和公共空间才能进行。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仍在努力让民众相信集体领导对于维护国家秩序的必要性。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多被呈现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灰色地带”，通常被界定为充满悲剧性的历史阶段。尽管如此，在官方文件中至少承认了：大跃进时期曾“犯下错误”，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犯下了许多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²

由于对1966年至1976年间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广泛禁忌，留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敢于创作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来书写“文化大革命”。³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89年6月4日这一分水岭之前（当时军队在北京以及全国多地对大规模示威进行了部分血腥镇压）中国的思想与文化氛围相对宽松。正是在这一时期，才得以出现杨绛（1911–2016）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她于1988年在北京发表的长篇小说《洗澡》，毫不掩饰地描绘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三反运动”期间人们互相揭发的情景，并以极为细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english.www.gov.cn/policies/latestreleases/202111/16/content_WS6193a935c6d0df57f98e50b0.html。

3 正如 Daniel Leese 在其著作《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中国的文化大革命）（Beck 2016，第11页）中所指出的，对于相关事件的叙述，多数研究倾向于采取前红卫兵的自我叙事，或是当时从事教学与教育工作的受害者的经验性视角；相较之下，关于农村社会与边疆地区历史进程背景的探讨，在史学研究中则明显处于边缘位置，未能获得相应的关注。

的笔触展现了党内成员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思想改造”的。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当时有限的开放空间，使得此类作品得以在官方出版体系内出现。⁴

杨绛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我们仨》，直到2003年才在中国出版。该作品以回忆的方式，叙述了她与其丈夫、著名学者兼作家钱锺书（1910–1998）作为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并涉及他们年幼的女儿在此历史背景下的生活境况。此书不仅展现了一个家庭在特定政治与社会背景中的个体经验，同时也为理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处境提供了独特的视角。⁵ 在杨绛之后整整一代人中，作家余华与王刚（均出生于1960年）同样开始对毛泽东时代的艰难境遇进行文学层面的反思。余华于1992年发表长篇小说《活着》，⁶ 作品主人公出身于地主家庭，先是投身与“红军”的对抗，继而沦为战俘，而在重获自由之后却又失去了全部家产与亲人。1995年，他又出版了小说《许三观卖血记》，⁷ 其中描绘了一位工人试图通过不断卖血来维持生计，但在大饥荒时期连这种方式也难以为

4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法文译本早在1992年便已问世，其德文译本则由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翻译，并于2023年在东亚出版社出版。

5 该书亦由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翻译，并于2012年在东亚书局（Ostasien Verlag）以中德双语版出版。

6 该书的德文译本由高立希（Ulrich Kautz）翻译，1998年由Cotta出版社刊行，其标题即沿用了上述译名。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94年，张艺谋（1950年生）便已将该小说成功改编为电影。

7 高立希将其译为《Der Mann, der sein Blut verkaufte》，2000年由斯图加特的克莱特—科塔出版社（Klett-Cotta）首次出版。

继。2005年问世的《兄弟》⁸ 则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种种极端化现象为主要批判对象。王刚的小说《英格力士》则以从上海来乌鲁木齐任教的一位新教师为中心展开：这位新教师不再教授俄语，而是改教英语（并且传授英国式的生活方式），并爱上一位有维吾尔族血统的女同事，这在学校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该作品最初于2004年在北京出版。⁹

以“文化大革命”前夕以及文革期间为主题的作品，大多是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从中国移居海外，或本身在国外长大的作家创作的。

1957年出生于上海的作家閔安琪（Anchee Min）在1984年移民美国后的前八年里创作了她的自传体小说《Red Azalea: Life and Love in China》（红杜鹃：一个女人在中国的一生）。该书于1993年在英国出版。¹⁰

同样带有自传性质的，还有张戎（英文名 Jung Chang）于1991年在伦敦出版的小说《Wild Swans》（野天鹅）。张戎与閔安琪同年出生，曾在四川亲历当地的事件。她在移居英国后撰写的这部小说一经问世便成为畅销书。作品中，她讲述了祖母、母亲以及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其中包括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迫成为红卫兵的那段生活。¹¹

8 高立希将其译为《Brüder》，于2009年由法兰克福的 S. Fischer 出版社出版。

9 高立希将其译为《Der Englischlehrer》，2014年由东亚书局（Ostasien Verlag）出版。

10 德语版《Rote Azalee: Ein Frauenleben in China》，由 Werner Peterich 译自英文版，于1994年由 Kiepenheuer & Witsch 出版社出版。

11 德语版《Wilde Schwäne: Geschichte einer Familie. Drei Frauen in China von der Kaiserzeit bis heute》，由 Andrea Galler 和 Karlheinz Dürr 从英文译出，并于1993年由 Knauer 出版社出版。

在戴思杰（1954年生）的小说《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中，西方书籍的阅读扮演了重要角色。该书于2000年由巴黎Gallimard出版。¹² 戴思杰在青年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并于1984年移居法国。小说的主人公是一群青年，当时的政治语言称之为“知青”（知识青年的缩写），他们大多出身于干部家庭，却被迫中断学业，被下放到农村或山区，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向贫下中农学习”。¹³

还应提到的是，1942年出生于北京的作家王容芬，她的小说《Steinway》于2022年出版了德语版。王容芬在1966年至1979年间曾被关押在中国的看守所和劳动改造营中，之后长期生活在德国。她在小说中描写了毛泽东血腥的迫害运动，尤其是红卫兵的残酷行径，以及当时女子监狱中非人的生存状况。¹⁴

与前述书中所描绘的极端而直白的酷刑画面相比，阚昱静在《不只是往事》中所使用的色彩几乎可以说是“淡彩”。然而，即便这里对肉体上的残酷描写较少，作者对精神折磨的细致刻画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伤，却同样深深地触动读者的内心。

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她是以母亲留下的“一叠厚达一尺的自我批评和认罪材料”为基础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这些材料从时间的跨度上记录了长达二十年的史实。从1958年

12 德语版由 Giö Waeckerlin Induni 翻译，书名为《Balzac und die kleine chinesische Schneiderin》，于2003年由Piper出版社出版。

13 当时党的领导提出的口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4 这部小说由明策尔（Frank Münzel，2020年逝世）翻译，他在书中以笔名“Lao Men”出现。参见 托马斯·魏劳赫（Thomas Weyrauch）在《ASIEN》第164/165期（2022年7/10月），第241-245页的书评。

开始，也就是大饥荒（1958-1962）的第一年，比所谓“文化大革命”（1966-1976）开始早了九年。她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阅读这些文件，并试图设身处地去想象：如果这些持续的屈辱与精神恐怖将由自己来承受，将会是怎样的经历？与此同时，阚昱静还表示，通过阅读这些档案，她对“中国人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一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可以说是一部受创伤者的传记。小说共66章，讲述了一个六口之家的生活，父亲秦世坤、母亲唐敏芝和他们的四个女儿，故事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市。

故事的主人公唐敏芝，只读了三年书，便被迫辍学。此后，她先后在多家工厂工作。1954年，她结识了在市工业局任职的秦世坤。1956年结婚后，她很快生下了几个女儿。随着饥荒日益严重，她多次从乳品厂奶粉加工过程中过滤产生的残渣带回家给小女儿们吃。到了六十年代，唐敏芝被调到当地法院，负责大量行政工作。

然而，正是这些从乳制品厂带回的残渣，竟在意想不到的方式上影响了她的一生。因为此事被党的干部质问时，她试图解释自己是担心小女儿们缺钙，所以才带回那些残渣，谁知这却被视为对体制的批评，这使她陷入更大麻烦。

不久之后，唐敏芝还被指控在财务账目上有不规范之处。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她被打成“反革命”，并被迫多年不断写自我批评和认罪书。1969年在她的女儿们年幼时，她因“顽固不化”而被投入劳改营，直到多年后才获释，那时她已病入膏肓，濒临死亡。

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唐敏芝才最终得以平反。新的法院院长把四大厚厚的档案夹

交给她，那里面保存着她过去所有的自我批评和辩解材料，并对她说，这些文件或许会“成为一个痛苦的、难以忘怀甚至令人恐惧的纪念”。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秦世坤“升迁”到地方人大工作，而唐敏芝也得以重新回到法院工作。生活似乎重新步入了正常轨道，但是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仍能感受到，那些年精神恐怖的阴影在全家人身上留下的深深的痕迹，尤其是在唐敏芝心中。

如果更深入地审视唐敏芝的性格，可以发现，她起初在读者眼中是一个非常可靠、品行端正的女性。但她的弱点之一似乎是带有一定的嫉妒心。这种倾向在婚前就有所显露：她对秦世坤办公室里潜在的“情敌”心生嫉妒，而那些女性反过来似乎也在排挤她。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最初的怀疑和争执。小说多次暗示，秦世坤无疑是个极具吸引力的男人。至于他是否真的沉迷于别的女人，或至少难以抵挡她们的诱惑，故事的发展似乎部分证实了这种可能，尤其在唐敏芝逐渐疏远他之后。然而，她所怀疑的那种“花花公子”形象是否完全属实，却始终没有定论。小说甚至暗示，也许正是唐敏芝的嫉妒，反而一步步把丈夫推向了别的女人。无论如何，嫉妒的场景随着时间愈加频繁，尤其是在唐敏芝从劳改营归来之后，她的嫉妒情绪的爆发有时甚至带上了病态的色彩。

当然，比起丈夫所谓个人的“过错”，在唐敏芝心头压得更重的，是长达二十年的洗脑、羞辱性的审讯和各种强制措施所积累的精神恐怖。尤其令她难以忘怀的是，因为那几次带回乳品加工残渣，党内同志对她的训斥。当她惊讶地反问，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那毕竟只是垃圾时，她得到的却是这样的训导：即便是垃圾，也是社会主义的垃圾，它也不

能成为个人的财产。这样的“判词”深深刻入她的记忆，以至于当大女儿彦玲问她：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时，她便能立刻一字不差地背出当年的这些训话。

那些年惩罚带来的巨大压力，终于在梦中找到出口：她躺在被子里，先是照例喊出“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愿……”这样的口号，接着却转为一连串恶毒的咒骂。这显示出，唐敏芝尽管接受了无数次洗脑，但从未真正把这些日复一日灌输给人民的口号内化。

作为一个只念过三年书的普通女性，唐敏芝并没有能力去辨析政治口号的真伪，尤其是在政策突然转向时。作者举毛泽东对刘少奇态度的转变为例：在她的第一篇自我批评里，唐敏芝写道：

“从1962年2月到‘四清运动’刚好三年九个月。在这三年多里，我由于自己狭隘、自私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根植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并且由于接受了刘少奇《黑六论》中的毒素，给党在政治和经济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我请求党给予我纪律处分，以鞭策自己。我一定会接受这个教训，重新做人。”（第8章）

像“刘少奇的黑六论”这样的口号，是被毛泽东用来为其打倒刘少奇提供正当性的手段，因为刘已不再符合毛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唐敏芝在那些年里被迫一再撰写自我批评，并不断重复党在曲折变化的路线中所提出的各种口号。结果，她的头脑中，如同无数其他人一样，逐渐形成了一幅被扭曲了的政治现实图景。正如阚昱静在其前言中所指出的，这些缺乏逻辑却被不断内化的口号，最终导致了一种“伪正确”的认知结构。因此，作者让她的母亲在回顾刘少奇时，正是从这种“伪正确”的语境中进行反思：

“有时候唐敏芝想：刘少奇甚至还是国家主席，可他都没能抵御资本主义的腐蚀，最终还是被毛主席及时识破并罢黜，挽救了我们的国家。”（第17章）

唐敏芝的性格，也在这些训斥和批判中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在涉及秦世坤一位侄子的自杀时有所体现。当她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因为被一位坚决不愿因恋爱而耽误学业的女同学拒绝而走上绝路的，唐敏芝却违背侄子母亲的意愿，反而将那位女学生举报给校方，导致她被开除。唐的女儿们此前一直以母亲的同情心为榜样，至此她们表现出极大的震惊，她们看到的是母亲一种近乎扭曲的正义感。

这种在压力下日渐僵硬的性格，也体现在她与大女儿彦玲的关系上。当彦玲向她坦白，自己与法院院长有婚外情时，唐敏芝毫不犹豫地斥责她道德败坏，毁坏了别人的家庭。彦玲原本以为母亲会替自己保守秘密，但很快发现整个法院都已知道此事，显然是母亲传出去的。

小说暗示，唐敏芝的长女彦玲大概是受母亲创伤影响最深的人。她对他人的支配欲，表现得很明显：一次，她要求司机额外送她和三位妹妹去郊游。司机在接她们回程时迟到，她便以一种严苛的、不容忍的态度训斥对方。读者会感到，彦玲在此刻竟与遭受过屈辱后的母亲极为相似，她在压迫别人时获得快感。

至于秦世坤的性格及其在那个年代的角色，小说给读者的印象是：尽管婚姻因唐敏芝不断的怀疑和嫉妒而备受折磨，但在妻子饱受压力的那些年里，秦世坤始终站在她这一边。这在次女彦秀坚持要像“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时尤为明显。起初，父母坚决反对，但在女儿坚持下，以及每个家庭必须送一个孩子下乡的号召下，他们最终妥协了。

除此之外，唐敏芝与秦世坤的对话（除了因“风流”之嫌争吵的场合）往往能看出，秦世坤对党日益荒谬的指令保持着批判态度，他甚至常常觉得好笑，比如有一次，他告诉妻子：两个“知识青年”认真讨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是也要上厕所”的问题。

细读小说，可以发现秦世坤对妻子的感情：尽管他有过外遇，但她依然对他非常重要；而且在两人之间，他显然更富有同理心。这在小说的一段思索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秦世坤任由唐敏芝去做，他明白，自己无法改变她和她那坚定不移，理直气壮的性格。这种坚定，有时几乎显得冷漠和疏离。它是何时出现的？从何而来？这对秦来说是个无法解开的谜。有时他也懒得去想，懒得去改变。他回忆起当年他们在同一单位工作的日子。唐敏芝性格里除了坚韧，还有她那对同事、对工作、对他以及对家庭无尽的热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身上的变化越来越明显。有时候秦世坤觉得，也许生活的重担太沉重了，特别是乳品厂的那场“贪污案”的后果。不是奶粉残渣被偷走，而是唐敏芝天生的热情和同情心被剥夺了。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它违背一切逻辑地给她的思想和感情上了惨烈的一课，最终塑造了她后来的坚定和理直气壮。这一切让秦世坤对她格外体谅。（第29章）

小说的核心内容讲述的是人们长期遭受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创伤，这些创伤甚至影响了几代人。它显然已经成为作者一生关注的重要课题。但是阚昱静本人在交谈中并不悲观，反而充满活力，思想活跃，对未来满怀希望。在对话中她一再强调，个体的思想自由是开明人类的核心目标。文学，正如她所说，给予我们在历史洪流中寻找真相的机会；在理想

状态下，它能让我们从过往的错误与歧途中汲取教训，从而避免重蹈覆辙。愿此书承此意而行，以感人心。

顾安达教授（柏林自由大学） 沙敦如博士（东亚书局）
2025年3月15日

Bibliographische Information der Deutschen Nationalbibliothek

Die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verzeichnet diese Publikation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bibliographie; detaillierte bibliographische Daten sind im Internet über <http://dnb.d-nb.de> abrufbar.

ISBN 978-3-911262-07-1

© OSTASIEN Verlag, Gossenberg 2026

1. Auflage

Redaktion, Satz und Umschlaggestaltung:

Martin Hanke und Dorothee Schaab-Hanke

Druck und Bindung:

Rudolph Druck GmbH & Co. KG, Schweinfurt

Printed in Germany